

# 现代性“技术批判”理论分析及其 风险社会理论的转向

欧阳光明 宋丰田

**【提 要】**现代文明在技术理性的推动下造就了一个与传统社会相对立的物质极大丰富的现代社会。科技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灾难。相应的对现代性的批判也就集中在“技术批判”之上,形成了以认识论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文化价值论批判等为特征的理性批判范式和以海德格尔的诗性技术观和福柯的技术权利谱系批判等为代表的非理性批判范式。风险社会理论的出现,将哲学反思建立在对现代技术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的经验描述上,实现了技术批判的风险社会理论转向。这种转变将技术的选择和讨论纳入到公共领域甚至整个社会中来,当公众的科学民主观念、公共空间权利探讨等等这一系列问题重新成为了科学发展观和风险社会共同追问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也就发现了在风险社会理论的参考下去探讨科学发展观实现的可能性。风险社会理论研究的经验主义的路向、现实主义的指向都为科学发展观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可操作性以及可行性。

**【关键词】**理性批判 非理性批判 风险社会 科学发展观

**〔中图分类号〕** B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952 (2010) 01—0059—07

福柯曾将康德于1784年写下的《什么是启蒙》一文视为“现代性态度的纲要”,在此文中,康德首先提到:“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sup>①</sup>所谓的不成熟状态就是人类没有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的自由。而福柯在理解现代性时也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态度”,而不是一个历史时期,不是一个时间概念。“所谓态度,我指的是与当代现实相联系的模式;一种由特定人民所做的志愿的选择;最后,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也就是一种行为和举止的方式……无疑,它有点像希腊人所称的社会的精神气质。”<sup>②</sup>按照福柯和康德对现代性的理解,现代性应该是一种理性和自由的时

代精神,也正如当今学术界公认的现代性观念的核心就是理性与主体性。而所谓的理性在韦伯对理性进行了条分缕析之后,让人们认识到了目的合理性或者说是“工具理性”,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价值之源和对现存事物批判的标准,随着工业化的深入,现代文明也在技术理性的推动下造就了一个与传统社会相对立的物质极大丰富的现代社会。但是这一切却掩盖不了现代性的危机,更掩盖不了人类在现代化的道路上的张皇失措,就像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像

①② [法] 福柯:《何为启蒙》,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29、430页。

一头猛兽一般拖拽着人类行走在悬崖边上。这一切最终被归结于技术理性之下，归结于现代科技之下，科技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却也相应地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灾难，相应的学者对现代性的批判也就集中在了“技术批判”之上。

## 一、技术批判的范式分析

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提到过，现代性批判应历史地看，它由来已久，黑格尔和尼采代表着不同的路向。黑格尔的批判是理性的批判，尼采的批判是非理性的批判。因此我们借助这个划分也将技术批判的范式分为理性批判和非理性批判两种。

### 1. 理性批判

理性批判范式是相当庞杂的，所以我们又进一步将技术批判的理性批判范式分为认识论批判、意识形态批判、文化价值论批判等。

首先是认识论批判，认识论批判将技术理性归结于认识论的“主客二分”，自笛卡尔哲学明确确立了主客二分思想之后，人不再是上帝的创造物，成了这个世界的绝对主体和唯一的主人，这也同样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源头，将客观世界包括整个自然界看成人类可以随意处置的客体，自然成为了人类的对立物，这时候，科技作为人类征服这个世界的工具的作用就彰显了出来，人类借助科技对自然展开了疯狂的进攻，结果却造成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威胁到了人类自身的生存。

认识论批判将这一切归结于主体性的膨胀，归结于工具理性的失去控制，正如阿多诺所说，现代科学的合理性及其对方法首要性的追求构成现代理性的危机。他认为，当理性以完全独立于它所运用对象的术语来定义时，认识及其对象就会变形或歪曲。<sup>①</sup>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中所要揭示的就是人在探求和控制自然的过程中发展了他的合理性，但现在却把他的理性变成了控制的工具，这种控制并不限于对环境、自然和他人的控制，它还反身控制人的内在自然。正是这个极端的理性化过程

使得“启蒙退化为神话学”。

其次是意识形态批判。“我们不得不和平地生产毁灭的工具、不得不极度地浪费、不得不接受防卫训练，这种防卫使防卫者和他们所防卫的东西成为畸形。”<sup>②</sup>这是马尔库塞在富裕社会中所看到的情形，“一种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中流行，这是技术进步的标志。”为什么技术进步给人类带不来自由和康德曾经许诺的现代性呢？现代性应该是理性和自由的，但是在这个富裕社会中，马尔库塞将一切谎言击碎，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单向度的社会”。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已经与技术结合起来，在技术统治的社会，技术理性已经转化为政治理性，它不仅仅是政治统治合法化的基础，而且就是政治统治本身。<sup>③</sup>作为合理性的代表的技术理性成为了政治合法化的工具，借助技术理性，意识形态控制了公众的潜意识，在不知不觉中，公众被训练成了对政治缺乏批判能力的“单面人”，意识形态的终结也在这个语境下被马尔库塞推上了舞台。因为意识形态已经包含在了生产过程之中，“生产机构及其所生产的商品和服务设施‘出售’或强加给人们的是整个社会制度。”<sup>④</sup>

丹尼尔·贝尔接过韦伯和维尔纳·桑巴特的论述，再一次深刻地阐释了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指出：在科学技术进步的推动下，资本主义工业生产迅速发展，“经济冲动力”不断亢奋，而限制物欲的“宗教冲动力”却越发显得苍白无力……在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长足发展的欢庆声中，“经济冲动力”成为唯一支配、推动和统治资本主义社会运行变化的力量。<sup>⑤</sup>就在这种环境下，贝尔提出了“意识形态终结”的

① 陈嘉明等：《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4页。

②④ 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11页。

③ 马俊领、刘卓红：《论物化批判的三种模式》，《广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12期。

⑤ 刘少杰：《后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14页。

论断。原有的意识形态让位于地区性的、工业化的、现代化的大众意识形态，旧有的意识形态的驱动力是为了达到社会平等和最广泛意义上的自由，新意识形态却是在讨论发展经济和民族强盛。在这个前提下，青年知识分子的内省力和批判力逐渐丧失在狭隘的技术世界里。

最后是文化价值论批判。如果说科技的发展，技术理性的发展，致使工具理性的泛滥，同样地也使人的“主体性”逐渐陨落。卢梭说过“人是生而自由的，但是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科技的发展其原始目的是使人的理性澄明，走上康德所说的启蒙之路，但是科技越发展，人类身上的枷锁却越来越紧。齐美尔从社会分工的角度对此亦有所论述：“在社会发展中，个人虽然愈来愈社会化，摆脱传统的束缚，但是愈来愈社会化，一方面创造着个性，为个人争得更多的自由空间，另一方面基于劳动分工结构之上的专门化和个体化也产生着各种不同的，相互并存的社会和群体的地位和个人人格的相似和适应，个体化的过程也变为拉平化的过程。”<sup>①</sup>个人的个性被一点点地磨蚀掉，每个人之间又被重新罩上了一层外衣。每个个性相同的人犹如摆好了的保龄球，虽然距离很近，却仍然没有沟通，一模一样的保龄球，一模一样的只有面孔，没有了五官，没有了感情。

关于现代艺术，本雅明和阿多诺也都有所论述，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的“机械复制”，是本雅明艺术生产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区分现代艺术和传统艺术的一个时代特征。在本雅明看来，尽管原则上一切艺术作品都是可以模仿或复制的，但是艺术作品的大规模的机械复制却是现代社会所表现出来的新东西。<sup>②</sup>阿多诺也做了类似的论述，流行文化对高雅文化的冲击也成为了阿多诺论述的重点所在。

## 2. 非理性批判

哈贝马斯在论述后现代理论取向时，提到沿着尼采开创的非理性批判路线，产生了两条路子，一条是福柯式的怀疑主义科学家试图用人类学、心理学和历史学等方法来解释权力意

志的反常化；另一条就是海德格尔式的比较内行的形而上学批评家采用一种特殊的知识，把主体哲学的形成一直追溯到前苏格拉底。所以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技术批判理论的非理性批判也选择这样两条分析路径。

首先，海德格尔的“诗性”技术观。海德格尔的一切哲学工作都是围绕着如何真正的实现“存在”的“澄明”，如何揭示真正的“存在”。所以他选择了从现代性的核心——技术入手去实现那“诗意的栖居”。因此问题最终就落实到如何从根本上根除“现代性”的技术根源。海德格尔很清醒地点出了“现代技术也是一个合目的的手段”，但是他却没有像其他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学者那样就仅仅停留在此，“照此看来，对于技术的正确的工具性规定还没有向我们显明技术的本质。”<sup>③</sup>技术的本质“是一种解蔽方式”，“在现代技术中起支配作用的解蔽乃是一种促逼，此种促逼向自然提出蛮横要求，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够被开采和贮藏的能量。”<sup>④</sup>为此，海德格尔指出必须改变近现代技术的这种逼索的性质，自然界应该是被显示和展现的而不是不断地被开发、转化、贮存、分配。技术的本质由“解蔽”变质为“逼促”，这才是现代社会危机产生的根源所在，海德格尔提出应该从艺术的“诗性解蔽”中寻找对技术本质沉思与批判的源泉，技术应该是“思与诗的二重奏”，让“物”也让“人”找到他们存在的家乡。

其次，福柯式的科技权力谱系。在福柯那里，科技话语早已深深地打上了权力的印记。在对疯狂疾病史的研究中，福柯最后指出，古典时期对疯狂的更进一步压抑，最根本的是由科学理性走上垄断地位造成的。他批判了现代知识论的鼻祖笛卡尔、牛顿等把科学理性和逻辑原则抬到无以复加的地位，要求人们的思想

① 《社会是如何可能的——齐美尔社会学文选》，林荣远编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② 陈嘉明等：《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0页。

③④ 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5、12页。

和行为都要遵循科学和理性，如果背弃了科学理性，人的行为就会被打上不合理的无效的甚至是违反社会规则的标记。权力与科技知识的结盟是整个现代社会的病症的根源，在福柯看来“真理意志”与“权力意志”在根底上是二位一体的：真理的产生与认定渗透着权力因素；权力的运作又来自真理话语的确立。就这样，人的主体性消失在了语言与权力的共同强暴之下，消失在了技术理性的主客二分之一中，无怪乎福柯喊出了“人已经死亡”的论断。

## 二、技术批判的风险社会理论的转向

关于现代性的危机，关于技术社会的批判，后现代、现代、理性、非理性的争论不绝于耳，在这些论争中到底有没有胜者，或者他们的胜利到底能给我们带来多少有价值的反思？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很清楚的是在这些争论中，有一个理论始终将争论搁置，而潜心于技术的经验化转向上来，不再局限于技术的预先设想或神话，而是将哲学反思建立在对现代技术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的经验描述上，这就是我们说的风险社会理论。

风险社会理论颠覆了经典社会学理论的范畴框架，避开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言路，超越了激进的意识形态批判路线。<sup>①</sup> 我们所要做的并不是非要将技术批判纳入到现代理论还是后现代理论范畴中，也不是必须要将技术批判贴上意识形态的标签，因为现代性的危机，技术带来的负面效应皆统统来自于技术本身，鲍曼在评论《风险社会》时提到“它们是控制和秩序的工具理性逻辑受其自身动力盲目牵引的形式……这就意味着出现了一条裂缝，现代性内部在理性的基础核工业社会的自我意识问题上出现了一个冲突，且这正发生在工业现代化的核心。”<sup>②</sup> 风险问题是内生的，因此解决技术社会的危机也必须从技术社会内部着手。

那么，风险社会理论对待科技的看法是怎样的呢？首先，风险社会理论并不否定人类实践，但强调重视人类实践的负面后果；它并不

否定社会发展，但是强调要重视社会发展的副产品；它并不否定发展科学技术，但强调要重视科学技术的副作用。<sup>③</sup> 所以就像吉登斯所言，风险社会理论既不是“消极的悲观主义”，也不是“盲目的乐观主义”，而是针对因为公司、政策制定者和专家们结成的联盟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而造成的风险提出学理上和实践意义上的建设性的意见，而不是像后现代主义者那样必须推翻理性和主体的专制，也因此必须对启蒙理想进行彻底的颠覆和解构。同样是对现代性危机尤其是技术理性危机的关注，风险社会理论选择了在解构的基础上建构的分析言路，承认现代性并没有终结，并且承认现代性危机解决的源动力仍然是现代性本身，以一种反思和内省的方式解决现代技术社会的危机才是风险社会理论的主旨所在。

关于对“风险”的理解，风险社会理论也不同于其他学者的一味的批判，而是选择了与哈贝马斯相似的视角。在对科技风险的分析中，我们看到风险社会理论对风险的认识从来都没有在一种完全否定的意义上来理解，相反他们强调了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危险性，也强调了风险之于社会的创新与发展的重要性。

针对这个现代社会的发展悖论：内生的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理论家们做了许多富有启示性的工作，我们可以这样说，贝克和吉登斯等学者对风险社会出路的探寻是具有极大意义的。针对风险社会，他们提出了自己的解决主张：

首先是贝克的亚政治制度化建设。安德鲁·芬伯格在《可选择的现代性》中提到：“技术转变的民主化表现了包含在技术本质自身内在的潜力。通过新的并且更加民主的程序使技术决策过程与美学的、伦理的规范和民族的特

① 任春雷：《风险社会理论的范式变革》，《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② 乌里希·贝克、安东尼·吉登斯、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现代化》，赵文书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4页。

③ 刘岩：《风险意识启蒙与反思现代性》，《江海学刊》2009年第1期。

性相连接不是乌托邦。”<sup>①</sup> 贝克所做的工作就是论证这个乌托邦的可行性和探寻如何实现的途径。因此贝克提出了自己的生态民主政治的设想，这同时也是一种“亚政治”，“亚政治意味着从下方形塑社会。从上方看下来，这导致了执行权的丧失以及政治的收缩和缩微化。作为亚政治化的后果，从前未卷入实质性的技术化和工业化过程的团体有了越来越多的机会在社会安排中取得发言权和参与权。”<sup>②</sup> 这就是贝克为了解决全球风险转型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问题而提出的现实层面的设想。在亚政治中，政治和道德替换了科学论证的优先权，针对“科技理性”和“社会理性”的断裂，贝克提出了用社会理性来规避科学实践本身潜在的巨大风险。

其次是吉登斯的“乌托邦的现实主义”。“如果没有同制度的内在可能性结合起来的话，寻求社会变迁在实践上就没有什么作用。”<sup>③</sup> 吉登斯知道在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环境下，降低危险是压倒一切的目标，所以他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乌托邦式的社会建构，而是在制度的内在可能性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生活政治的构想。在《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一书中，他指出：“生态政治是一种损失政治——是自然的损失、传统的损失——但也是恢复政治。我们显然无法回归自然或传统，但是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具有集体性的人，我们在积极接受人为不确定性的情况下，能够努力使我们的生活重新道德化。”<sup>④</sup> 直面“我们怎样生活”这个问题正是直面风险，直面风险就意味着通过公开公共的方式来共同探讨社会、环境的出路，将风险问题纳入到公共领域中来的同时，也与我们的生活价值联系在一起。所以说这种生活政治是与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的终极关怀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与贝克“生态民主政治”竭力与传统相分离不同，吉登斯的“生活政治”则是在传统中寻求解决风险社会的出路。

### 三、总结与设想——风险社会下科学发展观的实现

科学发展观这一范式可以从诸多方面入

手去研究探讨，侧重点不同所得出的结论也会不一样。如果我们将侧重点放在“观”这一字眼上的话，就会很清晰地将科学发展观定义为具有价值指向的社会意识范畴，经典马克思主义中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所以探讨如何让科学发展观得以实现也就必然要探讨科学发展观所存在的社会环境。科学发展观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并不可能生存于无土之壤中，也并不可能仅仅作为一种意识在这个社会中共生存，如果这样的话就会出现将科学发展观口号化的可能，抽离了科学发展观的生存环境也就架空了科学发展观，使其仅仅成为美好的空中楼阁。

继续探讨支持科学发展观实现的社会存在。科学发展观的实现应该依赖着这样一个社会环境，这个社会环境就是我们的和谐社会，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上才能让我们更有坚实的掌控力去探讨科学发展观的实现，这也符合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和谐社会作为一种正在建设发展和完善中的社会存在形态，是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践行相同步的，两者应该是并行不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在和谐社会中践行科学发展观是最具有物质坚实性和精神指导性的发展模式。和谐社会被学者们亲切地形容成“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话说”，“人人有饭吃”就是民生，“人人有话说”就是民主，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价值取向由以生产关系为核心，以生产力为核心到以人为本的发展历程，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共有的题中之义就是讲究“民生、民主”。

而接过这个叙述，沿着我们前两个部分的叙述方式展开探讨的话，和谐社会重视民生、

① 安德鲁·芬伯格：《可选择的现代性》，陆俊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7 页。

② 乌尔里希·贝克、安东尼·吉登斯、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现代化》，赵文书译，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30 页。

③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36 页。

④ 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李惠斌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

民主的现实,让我们看到了风险社会下“技术民主”实现的可能。风险社会理论以及其他经验主义的技术批判理论意味着一种转变,这种转变的范围和意义具有巨大的潜力,将技术的选择和讨论纳入到公共领域甚至整个社会中来,让我们看到了贝克的“第二次科学化”或者说是“反身科学化”的可能性,我们完全可以破除在“初级科学化”阶段片面的科学逻辑,将科学的怀疑主义延伸到科学本身的内在基础和外部后果。

我们在这里找到了风险社会理论与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共有的精神——那就是“人”。将传统科技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被戕杀掉的大写的“人”,重新拉回到社会发展的中心地位,这才是这些理论的共通之处。科学发展观以“以人为本”为核心价值,把人文精神、人文关怀渗透到科技、教育和人才等战略要素中,赋予科技、教育、人才要素以丰富的人文内涵。和谐社会力图构建的市民社会的雏形也具有丰富的人文指向,市民社会中公共空间的建构、公共决策的实现、民间组织的发展等等都是为“人”的重新彰显找到了现实依托,也同样为科技和社会发展的公共决策构建坚实的社会物质基础。如何让科技、社会的决策和发展从旧有的发展模式逃脱出来,从旧有的专家、政府、公司掌控科技、社会的发展到公众的共同决策,这是风险社会理论的课题指向。当公众的科学民主观念、公共空间权利探讨等等这一系列问题重新成为了科学发展观和风险社会理论共同追问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也发现了在风险社会理论的参考下去探讨科学发展观实现的可能性。而风险社会理论研究的经验主义的路向、现实主义的指向也都为科学发展观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可操作性以及可行性。

这些不同的选择“确立了一个在其中我们把特殊的替代看做目的和目标、用途和出场的‘世界’。它们还确立了在各种替代之间进行选择

的主体,我们在通过技术创造世界之中创造我们自己,因此,根本的技术转变是自我——相关的。成为问题的是形成,而不是拥有。目的是确定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丰富的理想和一种人类类型,而不是按照流行的社会——经济模式获得更多的商品。”<sup>①</sup> 风险社会理论解决现实风险问题,摆脱了原有的经济至上的论调,物质的极大丰富不是风险社会理论所追求的,不管是贝克还是吉登斯都力求实现的是一种生态、民主、文明的社会发展模式,是一种和谐的社会发展模式,将旧有的科技、政治的单向发展转变成为科技融合于政治中,实现一种技术的民主化,科技与政治同时走下神坛,科技是为“民生”,政治是为“民主”,科技与政治的结合是在公共空间中实现的,是在和谐社会中实现的。技术民主化简而言之就是让科学和政治走下它们的神坛,伴随着中国公共空间的逐渐形成,新一轮的科学和民主的启蒙逐渐深入人心,科技和政治的发展方向交由公共空间,由政府、科学共同体、公民共同决策,从整个社会结构入手,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同时,也规避了风险社会中可能遇到的风险。

在风险社会中我们所做的不是更多的争论,而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建构,一种类似于风险社会理论所带给我们的能从科学、社会、自我入手进行的全面的建构,或许这也是缘何风险社会理论能在世界尤其是近来在中国受重视的原因,也是我们在构建和阐释科学发展观时所吸纳的合理成分所在。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中如何规避科技和政治改革发展过程中的风险,或许风险社会理论能给我们提供些许镜鉴。

本文作者:欧阳光明是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宋丰田是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周勤勤

① 安德鲁·芬伯格:《可选择的现代性》,陆俊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8页。

#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on “Technical Criticism” About Modernity and the Turn of the Risk Society Theory

Ouyang Guangming Song Fengtian

**Abstract:** Modern civilization created a modern society with a great wealth of material as opposed to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by the technical rationali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ring enormous material wealth for human beings, but it also brings huge risks and disasters, which lead to the corresponding critique of modernity focusing on “technical criticism”. There exist rational criticism paradigm characterized by critique of epistemology, ideology critique and cultural values critique etc, as well as non-rational criticism paradigm represented by Heidegger’s concept of poetic techniques and Foucault’s criticism on the genealogy of technology rights. The emergence of risk society theory made the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built on the experience description of the complexity and richness of modern technology, which resulted in the technical criticism turning to risk society theory. In that case, it is possible to choose and discuss the technology in the public domain, even in the whole society. When the concept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and the risk society theory has a lot in common, in terms of the concept of science and democracy, discussion on the rights of public domain and so on, further discussion on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with reference to the risk society theory becomes a possibility. The risk society theory whose study focuses on the empiricism as well as realism lays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operability and feasibility of the concept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rational criticism; non-rational criticism; risk society; the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 观点选萃

### 论建国后毛泽东的政党外交观

杨 扬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2007 级博士生杨扬在《论建国后毛泽东的政党外交观》一文中指出：

毛泽东发展政党外交的机制健全，途径多样，其政党外交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坚持“独立自主、要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决定自己的政策”。毛泽东在发展与处理与他国政党关系时，强调世界各国的历史发展和社会状况是千差万别的，不可能按照一个统一的模式或固定的公式进行革命和建设，适合于每个国家的情况和特点的道路、战略和策略，只能由各国政党自己去探索和创造。二，坚持党际关系的平等原则，反对干涉他党内政。处理党的关系，绝不能有高人一等的思想，再大的党，在各国党面前也是平等的，不要把自己的东西强加给别人。各国党之间需要相互帮助，但决不允许任何外来的强制和包办。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干涉别国党的内部事务，只会使别国的革命事业和发展道路遭受挫折和失败。三，坚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完美结合。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也是伟大的国际主义者。他不仅是国家利益的坚定捍卫者，也始终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上，毛泽东强调二者的完美结合。四，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发展与不同类型政党的关系。毛泽东在发展政党外交的过程中，不仅同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交往，也发展与资产阶级政党的外交关系，无论是左翼的，还是右翼的，只要有利于党和国家利益，都是中共交往的对象。五，坚持团结的价值取向。毛泽东在处理与他国政党对外关系中，坚持团结的价值观。

(周勤勤 摘编)